

#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研究及其影响

陈喆

[摘要] 伦敦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传教士艾约瑟是 19 世纪后半期一位重要的汉学家, 在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等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本文以其中西语言比较研究为中心, 通过分析艾约瑟本人的研究、其追随者的观点以及来自反对者的批判, 再现那个年代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识状况。

[关键词] 艾约瑟 汉语 比较研究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119-06

从 16 世纪开始, 随着贸易和传教事业的展开, 西方人渐渐关注起遥远的中国。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载体, 为了解开中国古老文明的奥秘, 传教士和早期汉学家们在汉语研究上花费了不少精力, 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些成就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 学术界对这方面情况尚缺乏充分的讨论。本文将以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年) 的研究为中心, 对 19 世纪西人进行的中西语言比较研究进行专门考察。

## 一、艾约瑟之前西方人对中西语言关系的看法

自 16 世纪以降的 200 多年间, 西方人在研究过程中, 对汉语的起源提出了多种见解。在方法上, 他们大多重形而略声, 人为地割裂读音和字形, 单从文字结构上寻找源头。观点大致有两类, 即启示起源说和埃及象形文起源说。一些耶稣会士, 例如白晋 (Joachim Bouvet) 和马若瑟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nare) 等认为汉字源于基督的启示, 汉字的构造本身就反映了基督教的真理。<sup>[1](P31, 128)</sup> 普鲁士人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则认为, 中国人是含 (Ham) 的后代, 从埃及迁徙而来, 中国和古埃及的文字都是象形文。<sup>[2](P179)</sup> 继基歇尔之后, 法国汉学家德经 (Joseph de Guignes) 于 1759 年出版了《论中国人曾为埃及殖民者》(un 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égyptienne) 一书, 从语言的角度论证中国和埃及文明的同源性。<sup>[3](P100-103)</sup> 德经认为, 约公元前 1200 年左右, 埃及殖民者来到中国。后来, 埃及的历史被嫁接到了中国的历史上。中国最初几个王朝的兴衰实际上就是上埃及底比斯 (Thebes) 诸王的历史。<sup>[4](P153)</sup> 此后 100 多年间, 有不少人赞同这样的观点。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 仍有一批东方学家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 是在埃及文明衰亡后才兴起的, 此前本是蛮荒之地。中国的大禹就是埃及的美尼斯 (Menes)。<sup>[5](P9)</sup>

18 世纪, 也有西方人关注到了汉语的读音, 并提议使用词根比较法研究语言的起源。法国汉学家傅尔蒙 (Etienne Fourmont) 认为语言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初的单音节语言演化成为后来各种语言的词根。因此通过对各种东方语言的类比, 可以找出共同的起源。<sup>[6](P165-169)</sup> 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展开这项比较研究。由于传教和外交事务的需要, 到 19 世纪前期, 一些新教传教士也陆续开展中国语言问题的研究。1848 年艾约瑟来到中国时, 从事这方面探索的传教士已大有人在。马礼逊 (Robert

作者简介 陈喆,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生。

Morrison)、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麦都斯 (Walter Henry Medhurst)、裨治文 (E. C. Bridgman)、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 等人都对汉语进行过研究。而傅尔蒙的观点似乎代表了近代比较语言学的萌芽。西方人在语言学上的成就大大激发了艾约瑟的兴趣, 他将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到汉语研究上, 试图证明汉语和西方的语言同样也有共同的祖先。

## 二、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研究

1871年, 艾约瑟出版了《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个论证欧亚语言曾有共同起源的尝试》(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 一书。其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力图证明中国和西方的语言本是同根所生。

艾约瑟并未直接从语言方面切入主题, 而是先试图证明其假设的合理性。《圣经》记载人类曾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祖先, 艾约瑟据此指出波利尼西亚 (Polynesia) 和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岛民都是亚当的后裔, 只是因为常年与世隔绝, 忘记了从先祖那里继承的知识。但在其传统、语言、习俗和思想结构中, 多少能发现一些线索, 表明他们与文明国家曾有共同起源。19世纪中叶对西亚考古的研究似乎表明, 上古时代中国和西方在宗教、哲学等方面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故而艾约瑟相信其间必然存在某种关联。<sup>[7] (P3-5, 14-18)</sup> 由此, 他推断古代中国和西方的语言之间也有同样的联系。

接下来, 艾约瑟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论证这一假设。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是19世纪比较语言学研究中所常用的词根比较法。他研究了所谓的人类原始语言, 并为其归纳了四点特征: (1) 词汇是单音节的, 例如 bid、lod。(2) 一些动词性和代词性的词根在亚洲和欧洲的各语族中广泛分布。(3) 句法结构的特征主要为: 主语加动词; 动词加形容词; 形容词加名词; 主语加谓语再加宾语。汉语和英语的句法结构符合原始语言的特征。(4) 原始语言可能有简单的声调, 例如平、仄、长、短以及停顿和重音, 这在希腊语和汉语中都有表现。希伯来文也有精妙的重音系统。<sup>[7] (P57)</sup> 由此, 艾约瑟相信单音节的汉语使用自然的句法结构, 因此是现存语言中最古老的。<sup>[7] (P94)</sup> 然后, 他研究了一些读音变化的过程, 给出了一些声母辅音变化的规则。例如 g、d、b、z 最为古老, 后来变成 k、t、p、s, 而 f、h 是最后产生的。在日语中被借用的汉字, h 常读作 k, f 常读作 b。他以“佛”字为例, 指出该字旧读 but, 是 Buddha 一词的音译。根据这一规则, “分”当读成 bun, “缠”当读作 dan, “复”当读作 bok, “学”当读成 gak, “硬”当读成 ngang, “饕”当读成 deng。根据这些规则, 艾约瑟开始还原词根, 即将现今汉语的读音还原成古音, 然后和西方语言进行比较。接着他将汉语读音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声母基本上都是浊辅音。第二阶段, 部分浊辅音变成了清辅音。第三阶段, 入声逐渐消失。在艾约瑟看来, 汉语的古老性是埃及象形文、梵文和希伯来文所不能比拟的。汉语的句法结构是最自然的, 主语在谓语之前, 副词在动词之前, 形容词在名词之前, 当和人类原初语言相似。<sup>[7] (P81-87)</sup>

艾约瑟的研究穿梭于不同语言之间。在他看来, 闪族语言的词根都是双音节的, 名词没有后缀, 动词没有时态后缀, 因此比都兰语 (Turanian) 古老。蒙古语、希腊语和梵文的动词和代词富于变化, 动词置于名词之后, 因此属于晚近产生的语言。相比之下, 单音节的汉语使用自然的句法结构, 因此最为古老。<sup>[7] (P94)</sup> 因为人类喜好诗歌韵律, 于是引入新的规则, 改变了自然的句法结构。<sup>[7] (P102)</sup> 虽然各语言之间差异很大, 但艾约瑟认为从词根的相似性上依旧可以找出相互之间的关联。在该书的最后几章中, 艾约瑟研究了印欧语言。他用词根比较法来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关联, 并对每一个字母的发音都做了考察, 声称自己找到了很多不同语言所共有的词根, 甚至举出了 160 多组他认为由共同词根组成的汉字读

---

艾约瑟给出了一些例子, 比如“直”在旧读 dik, 泰米尔语读 takuti, 蒙古语读 t'egshi, 希腊语也用词根 dik, 拉丁文变成了 rek, 英语和阿拉伯语加上了前缀 s, 在希伯来语中则为 ts。汉语用“双”表示二的概念, 读 shong, 暹罗语读 song; “三”字暹罗语读 sam; “四”读 si; “五”字旧读 ngu, 暹罗语读 ha; “六”旧读 lok, 暹罗语读 hok; “火”旧读 hwa, 暹罗语念 kai; “头”旧读 du, 暹罗语读 how。艾约瑟由此得出结论, 暹罗语的 h 取代了汉语的 l 和 d, 暹罗语的 l 对应汉语的 h。“血”旧读 hit, 暹罗语读 luit, “虹”在暹罗语中读 lung。(参见: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p117)

音和英语单词。艾约瑟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汉语和英语之间，也出现在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

通过一系列的比较，艾约瑟终于“成功”地证明了他的假设：曾经有一段时间，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只有一种语言。虽然4000年来，语言不断分化，至今早已千差万别，但词根的相似性仍然表明他们都有共同的祖先。<sup>[7] (P386)</sup>在他看来，汉语比其他语言更多地保留了人类原始语言的特征。但问题是最古老的语言并非就是最好的语言。他将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六大体系，并归纳特征，如汉语讲究秩序，闪语充满活力，喜马拉雅民族的语言比较安静，操都兰语的民族热衷扩张，太平洋岛民的语言柔软，而印欧语言则显得非常高贵。<sup>[7] (P390)</sup>印欧语言、闪族语言、汉语都是直接从人类的原初语言中分化出来的。书写的发明和艺术的成熟，使得汉语和闪语很早就定型下来，而印欧语言和都兰语定型较晚，且仍然在变化之中。古时语言变化很快，但定型下来以后可以保持千年不变。艾约瑟对印欧语言非常推崇，认为它把人类文明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强调了西方民族在语言和文明上的优越性的同时，艾约瑟也不忘宣扬一些种族平等的主张。他指出，造就人的不是外貌而是精神，中国人与西方人有同样的灵魂。中国人的上帝就是基督教信仰的耶和華，只是中国人无法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

《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书出版之后，艾约瑟继续比较中国和西方的语言。从1871年到1872年，艾约瑟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汉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关系。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艾约瑟在推断汉字古音上又花费了不少精力，力图进一步证明他对中西语言关系的假设。

### 三、中西语言比较研究的支持者

艾约瑟的观点不乏支持者。在1871年12月的《教务杂志》上，一个署名奥西恩(Ossian)的人发表了一篇名为《汉语同凯尔特语的关系》(Connection between the Gaelic and Chinese)的文章，认为不少语言看似关系疏远，但还是存在一些过去人们未能留意到的联系。人类千差万别的语言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在阐述汉语同凯尔特语之间的关系时，奥西恩套用了艾约瑟的词根比较法，<sup>[8] (P179-183)</sup>甚至还用汉语的读音去倒推古代凯尔特语的发音。另有一个叫麦西尔内恩(J. S. McIlhaine)的人也同意艾约瑟的观点，认为汉语和希伯来语之间存在关联。<sup>[9] (P428-437)</sup>

曾活跃于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金斯密(T. W. Kingsmill)将艾约瑟的比较法推广到历史研究中，指出中国的宗教、文明、政治模式乃至相当一部分语言都来自雅利安人的传统，但在到达中国后的3000年间，雅利安人的体质特征因与本土居民融合而消失。<sup>[10] (P63)</sup>金斯密认为汉字“周”读Djow，与“昼”同音。Djow源于Dyu，Dyu是Dyaus的原型，即梵文中“明亮的天空”的意思。文王昌、武王发、周公旦等名字都可以同明亮、光明等意思联系起来，而周朝取代殷商就是一个属于雅利安种群的关于昼夜更替的神话。<sup>[11] (P140-142)</sup>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金斯密继续把语言比较的方法用于对上古文献的研究中，在经典中寻找可与梵文对应的汉字。英国人波尔(C. J. Ball)从事汉语和阿卡迪亚(Accadia)语言的比较研究，得到了金斯密的好评。<sup>[12] (P593-595)</sup>

1883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纪好弼(R. H. Graves)撰文比较了汉语和雅利安语言的词根，指出广东话发音比北方话更接近雅利安词根，和其他雅利安语言的词根相比，汉语和梵文更相似。<sup>[13] (P88-93)</sup>

在伦敦大学教授汉学的拉克伯利(Terrien de Lacouperie)比较了汉语和巴比伦的古代文字，并于1888年出版《巴比伦古文字及其在中国的衍生》(The Old Babylonian Characters and Their Chinese Derivates)一书。根据拉克伯利的介绍，早在1858年，一个叫奥帕特(J. Oppert)的人就已假定汉字和卡尔迪亚(Chaldia)文字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法国东方学家鲍迪埃(G. Pauthier)认为汉字和楔形文之间有联系，源头都是古代汉语。罗斯尼(L. éon de Rosny)认为楔形文的发音和日语相似，两者都起源于

---

例如汉字“芦”、“颧”、“辘”(lu)同拉丁文rota、rotundus，英语的reed、round，德语的rohr等都有相同的词根。汉字的“杯”pat与梵文的pātra，拉丁文的patera同根。(参见：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P351-352、P375-383)

亚洲的都兰语。在 19 世纪，比较汉字同埃及象形文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波斯卡文 (W. St. Chad Boscawen) 和克拉克 (Hyde Clarke) 等。法国学者莱诺蒙 (François Lenormant) 认为埃及象形文同汉字有相似的书写法则，汉字和由阿卡迪亚 (Akkadia) 进入巴比伦的象形文字可能都起源于咸海附近。上述学者大多将汉语视为最古老的语言而汉字几乎就是其他古代文字的源头，而拉克伯利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认为中国的文字乃至文明都源于巴比伦。<sup>[14] (P2-3)</sup> 虽然在一些具体结论上，拉克伯利与艾约瑟有差异，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是通过比较来寻找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共同之处。

#### 四、汉学界对艾约瑟中西语言比较研究的批判

在得到上述支持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艾约瑟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和质疑。《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经出版，就引来了时人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德国传教士、汉学家欧德理 (Ernst John Eitel) 和英国领事官、汉学家瓦特斯 (Thomas Watters)。

1872 年，欧德理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上炮轰艾约瑟。在一篇名为《诗经》(The She-King) 的文章中，欧德理先赞扬了理雅各的翻译，接着开始批判艾约瑟及其追随者们。在欧德理看来，艾约瑟妄图成为汉语研究领域的马克斯·穆勒，但穆勒只将自己的研究限于雅利安语言的范围内，不讨论各民族在语言上的关系。而艾约瑟则毫无顾忌地在汉语、希伯来语以及梵文之间讨价还价，试图还原出雅利安语言和都兰语系之间无人知晓的所谓共同母语。艾约瑟认为汉语是现存语言中最接近原始语言的，而欧德理则认为汉语是在孔子前几百年才发展完善的，远非艾约瑟想象得那么古老。<sup>[15] (P7, 10)</sup>

似乎是因为艾约瑟对反对者的批评不以为然，而且还有人效法其做法，第二年欧德理又写了一篇题为《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 的文章，批判所谓的业余汉学家用过于简单的方法处理复杂的问题，打着科学的旗号将一些事实从合理的关联中抽取出来加以普遍化，混同了假定的结论和理性的论证。

1872 年，瓦特斯在《中国评论》上专门针对《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书发表了书评。瓦特斯认为当时对东亚语言的研究相对缺乏，现有的材料不足以支撑艾约瑟的理论，<sup>[16] (P53)</sup> 况且将来是否可以确证存在所谓的原始语言，尚存疑问。艾约瑟的论证很明显是从主观理论出发，再找材料证明，在论述某些观点时又依赖《圣经》为权威。瓦特斯对这样的操作方法极其反感，指出《圣经》没有教导任何科学的知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创世纪》的作者知道除自己母语以外的语言，更不用说语言学。在他看来，西方世界同中国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双方在语言、文字、政治形式和生活方式上相差甚远，不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sup>[17] (P2)</sup> 艾约瑟的研究在他眼中几乎一文不值。

艾约瑟的著作出版后一年，德国人施古德 (Gustave Schlegel) 也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与雅利安》(Sino-Aryaca) 的书。施古德批判艾约瑟没有对德国印欧语言学家的研究予以足够的重视，且对其他东方语言涉猎太广。但他自己也广泛征引了马来语、暹罗语和台湾土著语言，其为寻找与汉语同源的语言所做的尝试性研究与艾约瑟水平相当。他对古汉语结构的研究主要依赖厦门话和广东话，与艾约瑟相比也未见高明之处。<sup>[18] (P176)</sup> 瓦特斯批判艾约瑟的体系是一个梦想，却赞赏施古德的研究是比较汉语和雅利安语言的首次科学的尝试。<sup>[19] (P568)</sup> 欧德理精研佛教，发表过《佛教演讲录》(Three Lectures on Buddhism)，后来又编有《中国佛教手册》(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瓦特斯也是当时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后来将《大唐西域记》译成英语，并著有《汉语论集》(Essays on Chinese Language)。他们通晓多种语言，对宗教问题同样也有研究，因此这两个人对艾约瑟的批判具有相当的力度。欧德理和瓦特斯对艾约瑟的评价也许可以代表两个不同的汉学研究群体的态度。

英国领事官、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汉学教授的庄延龄 (E. H. Parker) 也全然否定了艾约瑟的研究方法，指出唯一可以确定中国在语言学上的地位的语音基础就是汉语各个方言的比较研究。虽然也能举出一些汉字和印欧语言的词根在读音和含义上相近，但并不表明能够马上找出大量的此类对应。问题并不是要找出多少类似的对应，而是要验证两个不同语系是否遵循同一变化规则。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规则，则要根据此将读音还原，然后观察两者之间是否有共同的起源。在庄延龄看来，纪好弼的研

究如同儿戏，<sup>[20] (P151-164)</sup> 而拉克伯利根本算不上汉学家。<sup>[21] (P301)</sup> 《圣经》和所有类似的古代典籍一样错误百出。<sup>[22] (P499)</sup> 此外庄延龄延续了欧德理和瓦特斯的观点，反对把汉语同西方语言牵扯上关系。<sup>[23] (P317)</sup>

1893年，弗兰克（O. Franke）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和比较语言学》（China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的文章，对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法进行批判。弗兰克认为，只有同属一族的语言才能相互比较。即便艾约瑟的理论成立，汉语中也只有那些假定是中国人和雅利安人分离之前就已存在的词汇才能拿来同雅利安语言进行比较。问题是汉语属于哪一个语族尚无定论，而多数汉学家仅仅只是把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罗列出来，实际上意义不大。因此中西语言比较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用于比较的语言都不是各自所属语族的最初形式，所以任何将汉语同雅利安语言联系起来的研究都毫无价值。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人类曾有共同语言的假设，而这一假设的来源又是依据《旧约》的记载。在此，弗兰克提出了和瓦特斯一样的批判，认为科学的研究不能诉诸宗教信仰的权威。对于艾约瑟的词根还原法，弗兰克认为即便还原出来的古老词根都是单音节的，也不能证明存在一种只有词根的语言。语言的发展未必就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汉语的读音就有简化的趋势，同样其他语言也都在力求简化。<sup>[23] (P310-327)</sup> 1896年，莫伦道夫（P. G. von Möllendorff）在《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了《比较语言学的局限》（On The Limitation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一文，对不成熟的词根比较法严加批判，认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不同语言在语法上的差异性。他指出语法是在各个语种形成时发展起来的，假设各种语言在语法形成以前就有关系，缺乏科学上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一种原始语言没有语法。艾约瑟注重读音上的比较，莫伦道夫则认为字词的读音和含义并非必然对应，不同语言中相同的发音完全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词汇的含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此不能光从读音上推断关联。语言既在不断分化，也在不断流变。文明发达的民族，其词汇会流向落后民族，一如日本、朝鲜和印支各国对汉字的借用。如果说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源于同一母语，则相似之处不应只表现在读音上，也会反映在表达方式上。倘若语言和种群分化之时，语法尚未形成，那么探索这样一个遥远的先祖便毫无意义。最后，莫伦道夫指出比较不同语族的语言将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比较语言学只能限定在同一语族的范围内。<sup>[24] (P81-101)</sup>

## 五、余论

无论是对艾约瑟研究的支持还是批评，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19世纪70年代，欧洲的东方学研究在解读东方古代语言上已取得很大进展，许多不同语言之间潜在的关联被发掘出来。但汉学在东方学中的地位仍然非常边缘，其原因也许正如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所言，比较语言学、印度学以及《圣经》研究的方法很难运用到汉学研究上，而且汉语和西方语言缺乏可比性，无法引发西方人的研究兴趣。<sup>[25] (P524)</sup> 如其批判者所言，艾约瑟的比较研究确实存在种种缺陷，但他试图将汉语和西方语言联系起来，将中国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榫接在一起的努力，有助于引起西方世界对汉学研究的关注。

19世纪，仍有一些西方人试图寻找中西文明的共同起源。在语言方面，艾约瑟通过还原词根，比较中西语言的读音，归纳共同点，追根溯源。他的追随者也借用了类似的方法。也有一些东方学家通过字形研究把汉字和埃及象形文牵扯上关系。以艾约瑟为代表的一批以传教士和驻华领事官为主体的所谓“业余汉学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这股潮流中的一个分支。

热衷于比较中西语言的西方学者们搭建起一座沟通中西的桥梁，把一些在欧洲刚刚发展起来的语言、历史和神话学理论运用于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解读。他们抛开了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明的解释，醉心于自己所构建的体系中。在他们看来，只要运用一些他们认为恰当的研究手法，中国便不再显得古老而神秘。中国文明中的每一点一滴，都能在西方文明中找到对应。

艾约瑟的做法并非全然新颖。从17世纪开始，便一直有人将中西方的语言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虽然结果略有不同，但不论是认为汉字起源于埃及象形文，还是将汉语视为人类最古老的语言，最终的目标都是探寻人类自身文明的源头，并在汉语中寻找西方文明的影子。

艾约瑟的做法虽然不能代表 19 世纪后半期东方学界和汉学界的普遍观点，但的确有一批学者和传教士在从事类似的研究。他们有些是艾约瑟的追随者，有些则未必受他的影响。通过艾约瑟对汉语的研究，他的追随者和同盟者的看法，以及来自反对者的批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人对中国语言的认识状况。自 17 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一股思潮，认为世界各国的文明和语言相互关联，并可以通过归纳共同点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拟出人类原初的语言。艾约瑟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成为了反对者们的众矢之的。

#### [参考文献]

- [1]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nare,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M].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M]. Stuttgart: Steiner, 1985.
- [3] Joseph Fr. Michaud & Louis Gabriel Michaud. *Biographie universelle ancienne et moderne, ou Histoire par ordre alphabétique de la vie publique et privée de tous les hommes qui se sont fait remarquer par leurs écrits, leurs actions, leurs talents, leurs vertus ou leurs crimes* [M]. Paris: 1817.
- [4] *The Annual Register or A View of the History,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for the Year 1760, the Seventh Edition* [M]. London: Pall & Mall, 1789.
- [5] J. Marshman. "A Disser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cluding Tables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and of the Chinese Monosyllables" [J]. *The National Quarterly Review*, Vol. V No. 9, 1862.
- [6] Céile Leung. *Etienne Fourmont: Oriental and Chinese language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M].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7] Joseph Edkins.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 [M]. Tai 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原书初版于 1871 年，现据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1 年重印本征引)
- [8] Ossia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aelic and Chinese" [J].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IV, 1871.
- [9] J. S. McInaine. "Biblical Researches II, Cushite Ethnology" [J].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VI, 1875.
- [10] Thomas W. Kingsmill. "The Aryan Origin of the Chinese" [J]. *The China Review*, Vol. 2, No. 1, 1873.
- [11] Thomas W. Kingsmill. "The Mythical Origin of the Chow or Djow Dynasty, as set forth in the Shoo-King" [J].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Vol. VII, 1871&1872. (以下简称 J. N. C. B. R. A. S.)
- [12] T. W. Kingsmill. "Akkadian Affinities" [J]. *The China Review*, Vol. 22, No. 3, 1896.
- [13] R. H. Grave. "Aryan Roots in Chinese" [J]. *The China Review*, Vol.12, No. 2, 1883.
- [14]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Old Babylonian Characters and Their Chinese Derivates* [M]. London: Trübner, 1888.
- [15] E. J. Eitel. "The She-King" [J]. *The China Review*, Vol. 1, No. 1, 1872.
- [16] Thomas Watters.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J]. *The China Review*, Vol. 1, No. 1, 1872.
- [17] Thomas Watters. "Tao 道: — An Essay on a Word" [J]. *The China Review*, Vol. IV, 1871.
- [18] [加] 蒲立本著, 张洁译. *欧洲的汉语音韵学研究* [J]. *国际汉学* (第 9 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3.
- [19] Joseph Edkins. "Recent Researches upon the Ancient Chinese Sounds" [J]. *The China Review*, Vol. 22, No. 3, 1886.
- [20] E. H. Parker. "The Chinese Language" [J]. *The China Review*, Vol. XV, 1884.
- [21] E. H. Parker. "M. Terrien de La Couperie as a Sinologist" [J]. *The China Review*, Vol. 13, No. 5, 1885.
- [22] E. H. Parker. "Chinese and Sanskrit" [J]. *The China Review*, Vol. 12, No. 6, 1884.
- [23] O. Franke. "China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 [J]. *The China Review*, Vol. 20, No. 5, 1893.
- [24] P. G. von Möllendorff. "On The Limitation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J]. *J. N. C. B. R. A. S. New Series* Vol. XXXI, 1896-1897.
- [25] 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责任编辑: 郭秀文

to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gres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which all has benefi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r. Meng Dan's Research of Zhuxi Centralized around 'Structural Images'

Mao Guomin 68

Donald J. Munro uses structural images in his study of Zhuxi's works, such as stream, family, mirror, body, plant, etc., to explain the latter's concept of man, and to reconstruct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As a result, Donald J. Munro reconciles two polarities of the concept of man in Zhuxi's philosophy to make it a perfect whole. One is the polarity between the family preference and the obligation for altruism beyond the family, the other is the polarity between self-discovery of morally relevant truths and those objective rules of conduct formulated by others.

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ies of Regional Culture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Li Qingxin 108

Since 1980s, the large-scope work of salvaging and investigating the sunken ships has been done many times by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Philippines, Vietnam, and Indonesia, etc., which makes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marine archaeology in the East Asia. The maritim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outstanding and of great value in science. It does not only provides a large quantity of precious objects and data for research i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but also put forward the study on the marine silk route and expands the field of studying the regional marine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Joseph Edkins, a Landon Missionary's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 and Western Languages and Its Influences

Chen Zhe 119

Joseph Edkins is a very important Sinologis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e was famous for his achievement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and religion. The paper, focused on his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ose of the west, will try to reconstruct the Occidental concept of Chinese language through Edkins' study, his followers' ideas, and the criticism from his opponents.

On the Multiple Origins of the Yue Dialect

Gan Yu-en 147

In recent years, the view points that the Yue dialect was formed originally around ancient Guangxin attract a lot of people's attention. Among them, Mr. Ye Guoquan and Mr. Luo Kangning's theory of cultural origin around the areas of Xijiang River has greatest influence. However, though ancient Guangxin is the earlies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at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Yue dialect must origin from the area of the Xijiang River. So, the paper defines the Yue dialect first, and then prov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at the Yue dialect could not origin from a single place of the Xijiang River area.